

三邊互動 三邊互動 三邊互動

2024年堪稱「超級選舉年」，佔全球人口一半以上的國家和地區將迎來領導人選舉，年底舉行的美國大選尤其是舉世關注。在民粹主義席捲世界的今天，各國的內政和外交政策走向將會出現怎樣的變化？對國際經濟秩序將會造成怎樣的影響？敝刊歡迎海內外專家學者賜稿，參與有關問題的討論。

——編者

現代民族文化構建需要一種「喚醒」

檢視近百年中國話劇學術史，可以發現一個有意思的現象：縱使時代與文化語境幾經變遷，但總有幾對論題始終纏繞其中——現代性與民族性、政治性與藝術性、寫實性與寫意性。幾對論題雖出於不同的視角，相互間卻有深層的理論勾連，有些論辯似乎至今仍在繼續。近讀高子文〈民族性、現代性與話語建構：「話劇」概念的生成與演進〉（《二十一世紀》2023年12月號），頗有「聽唱新翻楊柳枝」之感。在歷史的迴響中，作者對於如何建構「現代民族文化」發出了自己的聲音。

高文從「話劇」概念切入，以豐富的史料梳理，辨析其在

中國生成與演進的來龍去脈，立足點依然是現代性與民族性問題。早期話劇（文明戲）處於中國戲劇剝離古典形態向現代過渡的中間環節，而五四後的現代話劇則以民主主義、人道主義等啟蒙思想為基本內容，直接借鑒外來形式而生成。話劇通過實現戲劇藝術的現代化，推動現代中國民族文化的建構，這就是其顯著的歷史地位與作用。

那麼現代性與民族性何以成了一對糾纏不清的矛盾？作者首先對非此即彼的二元對立思維提出質疑，話劇史上民族性、現代性並不總處於衝突對抗狀態。關於「民族主義」內涵，高文的分析尤為鞭辟入裏：這是一把「雙刃劍」，既可體現民族的覺醒與獨立意識，但走向極端又難免掉入國家主義或復古主義的陷阱。在狹隘民族主義、民粹主義泛濫的當下，要特別警惕「民族化」包裝下拒斥外部交流、開歷史倒車的傾向。筆者很贊同文中的觀點——並非所有的傳統文化都自然地構成現代民族文化，即便其中優秀因子也需要一種現代性的「喚醒」，需要與他族文化的互動，方能成為現代民族國家建構與發展的推動力。

最後不妨補充一個例證。話劇的寫實、寫意在中國特殊語境中一度被當作現代性與民族性的分界線。現代話劇對現實主義的選擇確實符合啟蒙理性需求，但在意識形態干擾下逐漸固化，造成審美層面上的接受隔閡，也帶來了長期未決的「民族化」困擾。直至1980年代「寫意戲劇觀」討論與「探索劇」興起，話劇人從現代主義藝術中重新發現民族傳統的魅力，寫實與寫意才有了深度融合，這無疑就是一次成功的「喚醒」。

丁羅男 上海

2023.12.30

當代中國修志運動是如何展開的？

水利志作為水利工作者與研究者的案頭必備，是了解一地或一河水利發展脈絡的百科全書，亦載有其他文獻難覓的獨門資訊。與其他志書一樣，水利志也有舊、新之別，兩者通常以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前後為界劃分。作為社會主義文化建設的一部，新志編修在改革開放後又露新貌，在國家力量助推下，舉國上下掀起普遍編修社會主義時代新型地方志之運動，新水利志的編修亦由此蔚然興起，其規模之大、範圍之廣、成書之多堪稱歷史奇觀。在1982至2006年中國第一輪江河水利志編修的二十五年裏，1980年代可謂高峰期，此間修志工作究竟是如何發動和運作的，所成志書呈現甚麼樣的特點及具有多大的價值，是值得深入研究的問題。

張景平、陳智威〈中國當代水利志修纂的興起——以河西走廊為例〉(《二十一世紀》2023年12月號)即以1980年代河西走廊水利志的修纂為例對上述問題管中窺豹。張氏出身甘肅，在河西走廊水利史研究上耕耘有年，曾參與主編《河西走廊水利史文獻類編》，擔任《疏勒河志》、《討賴河志》總修纂，現正統籌「明清以來河西走廊水利文獻集成整理與研究」項目，這些經歷使他能更清晰地釐清該地水利志修纂前後的經緯，剖析其間舊與新、專業與政治、上級與下級之間的互動與張力。尤為可貴的是，他們能挖掘出長眠於檔案室、圖書館未曾出版的志書，追訪到參與修志的當事人，讓其研究更具獨到之處。

文章的研究意涵主要有三點：其一，揭示水利志生成的運作機制，認為此次修志係水利行政系統「自上而下推動、自下而上完成」，文史功底薄弱的水利幹部與技術人員被臨時差遣充當修纂的主力，地方志部門與水利部門之間協調不濟導致多數水利志書稿未能正式付梓出版。其二，剖析水利志作為社會主義時代新型地方志的特點，指出在對「舊時代」水利的書寫上，對傳統水利工程的评价相對中肯，對傳統水利管理制度則批評有加，凸顯時代話語的表達特色；在體例建構與表達形式上，展現當代水利工作的內容以及現代水利科學的邏輯。其三，評估水利志的文獻價值，提到水利志輯錄的佚書、碑刻、民間傳說，

以及記述的1949年以後部分歷史，具有珍稀性和重要性，但需要讀者加以判斷。

該文為研究當代中國修志運動提供了範例，對觀照和解讀1980年代中國社會主義文化建設亦不無參考意義。

張岩 天津

2024.1.1

毛澤東時代不堪承受的「革命」

1967年1月，以上海「一月革命」為起端，文化大革命進入所謂「全面奪權」新階段。其間，群眾運動充分展現，派性愈演愈烈，7至9月更成了失控的三個月，這與「偉大領袖」的「大治」期許背道而馳。解剖奪權個案(涵括特定事件)，透視群眾派性衝突的複雜結構與深層動因，意義非凡。

嚴飛、武瑞的〈中央政策分歧與地方派系分化——1967年廣州奪權運動〉(《二十一世紀》2023年12月號)擇取廣州「一·二二」奪權作樣本，試圖梳理所涉各方間的複雜互動與博弈，進而透視派性激化之根源。文章認為，圍繞廣州奪權的派性分歧最初並不算大(主要是對奪權時機是否成熟看法不一)，後來持續激化的主要動因有二：一是毛澤東、周恩來奪權構想各異，以及「翻燒餅式」的介入；二是中央文革小組與廣州軍區為爭奪運動控制權而相互拆台，並非源自意識形態分歧，抑或對文革持見差異，更無法用「保守」、「激進」來區分。簡言之，圍繞廣州奪權的派性衝突，產生於文革過程中，是涉事各方互動與

博弈釀就的，「社會衝突論」解釋範式失效。這承續了董國強和魏昂德(Andrew G. Walder)系列論著的觀點與思路，不失為有理論創獲的重要嘗試。

與此同時，該文所提以下問題有必要繼續深挖。其一，毛澤東和周恩來圍繞奪權的互動。其具體如何展開？語境如何？差異度如何？根源何在？其二，涉事各方在派性激化中的權重。既有研究表明，奪權過程中，各群眾組織間「競賽革命」的現象相當普遍，所謂「老造反」往往自認為最有資格，所謂造反精神欠佳者唯恐繼續「落後」、往往「更革命」。考察文革派性在1967年之前與之後的聯繫，或許不可或缺，更能彰顯廣州奪權的獨特價值，該文所述如下現象也才能更圓滿解釋，即文革群眾「各懷訴求」，其分裂的根源「在於權由誰來奪、如何奪」，等等。至於以趙紫陽為首的廣東黨政系統，是奪權必然牽動的要素，也應予以重視。

此外，1967年4月14日周恩來親蒞廣州「和稀泥」，反而為斯年夏天席捲廣州的大規模武裝派系鬥爭埋下隱患，亦值得重視。筆者以為，其動因確如該文所言，即中共高層的指示調整牽動各派的命運，尤其是政治身份重置(諸如「革命」、「反革命」、「左派」、「右派」等)。政治身份的確定與重置，攸關個體的生存與發展，在毛時代往往令人不堪承受。有理由相信，這極可能是文革派性的內質，是文革群眾在乎中共高層介入(特別是高層的臧否)，以及文革派性激化抑或止息的深層動因。

樊建政 上海

2024.1.1